

以传世之心打造传世之作

我把自己的唱法定义为“中国唱法”，即唱好中国歌的唱法。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科学的民族声乐体系，唱得字正腔圆、声情并茂，让老百姓听得入耳入心，是重中之重



对话人：张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洪治纲(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赵慧平(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把文学当成毕生追求的神圣事业，不矮化；用生命锤炼精品，不讨好；与读者做真诚的心灵沟通，不敷衍。这是柳青、路遥、贾大山三位作家成就自我的路径，也是一切作家迈向成功的必然选择

尊重生活 尊重创作 尊重读者

张江：一提到当代作家楷模，我们就情不自禁地想到柳青、路遥、贾大山等，仰视他们执着于现实生活的坚定、面对名利诱惑的超然、用生命锤炼作品的赤诚。有人说，这样的作家只能是特殊时代的产物，不可复制也不必复制。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天还会出现柳青、路遥、贾大山吗？

张志忠：德国伟大诗人歌德说，生活之树常青。社会生活永远是第一性的，作家创作可以接近现实风云，可以风花雪月，可以剖析心灵，可以天马行空，但文学土壤永远是现实生活，离开这片土壤，文学就失去生命之源。

当代作家柳青、路遥、贾大山，他们所处的三秦厚土、燕赵大地是中国文明传承久远的所在，也是百年中国现代转型典型的所在。这三位被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到、高度赞扬的优秀作家，其创作年代和表现的生活各有不同，但他们对待生活、对待人民、对待文学事业的热忱与忠贞却一脉相承，彪炳文学史册，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开掘和传承。

这三位作家都把文学当成毕生追求的神圣事业，在文学创作上行高致远放下个人名利。柳青为写出史诗性作品，放弃大城市优渥生活，14年身居皇甫村，还直接参与和指导当地农业集体化运动。他的信条“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文学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被路遥继承；为创作《平凡的世界》，路遥三读《红楼梦》、七读《创业史》，更身体力行尊重生活实践，为写出煤矿工人的生活，他换上工装下到矿井，为体会打工生活，他跟着弟弟到建筑工地上做临时工。贾大山淡泊名利，曾在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力荐下担任县委文化局局长，为正定县文化建设做出很多贡献，功成身退回归文学创作，小说越写越精。

尊重生活、尊重创作、尊重读者，是优秀作家之所以优秀的三个支撑点。以最大的真诚对待读者是他们的职业美德。三位作家都曾遭受冷遇或误解，《平凡的世界》因其现实主义风格被贬抑为“过时”，但路遥始终相信广大读者，他的作品也在年轻人那里得到强烈回应。贾大山同样看重读者反响，病重住院时几个中学生的探访让他感到莫大欣慰。

熔铸创作主体的热血与情怀

现实主义精神具有超越性

张江：为什么当下少见柳青、路遥、贾大山这样的作家？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然可以罗列出若干客观原因：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剧增、对生活的认知难度更大、作家面临的诱惑更多、媒介格局发生变化、文学受关注度下降等。这些因素当然客观存在，并且确实对作家产生重要影响，但我们要强调的是，没有哪个时代的作家生活在真空中，每个时代的作家面临每个时代的问题。决定性因素在于，我们今天的作家是否在用生命和热血铸就文学。

洪治纲：柳青、路遥、贾大山等作家受到一代代读者青睐，并引发人们不断

不断推出传记精品

杨正润

传记是一个人生平的记录。其范畴广阔，除常规的传记和自传外，也包括言行录、回忆录、书信、日记、口述等，除文字为载体外，还有以电影、视频为载体的传记影视。

人类文明史上，传记对社会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论语》作为孔子言行录，确立了古代中国伦理和道德基本规范。中国又是十分重视历史的国家，强调“以史为鉴”，“二十五史”都是纪传体，大部分内容都是传记，包含3万余人的传记材料，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民

族有如此众多的传记传世。“二十五史”中许多篇章或改编成戏剧和小说广为流传，或被《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引用得到普及，中国“忠孝节义”的传统价值观就通过人物传记体现出来。

进入现代社会，各国都更加自觉地培育传记文化。上世纪30年代苏联进行经济和文化建设，其中一件大事就是高尔基倡议继承俄罗斯“名人传记”传统，在国家支持下，高尔基主编的《名人传记》丛书问世，成为当时俄罗斯最大的一套丛书。高尔基提出以“各个时代

特定年代坚持现实主义原则的作家，是可以称之为“人民作家”的写作者。我们今天重读这些作家的作品，能够感受到他们这一属性：既属于特定年代，又超越特定年代。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柳青写《创业史》时身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斗争烙印；路遥、贾大山登上文坛，是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氛围使得他们的视野和眼光较之柳青有了明显变化。他们笔下的人物有了更多个人意志、更多个性特征。如果说梁生宝是社会主义创业者的话，高加林同时还是个人奋斗的典型，社会的进步赋予高加林、孙少平个人理想以同样的光彩，这就是进步。

现实主义立场使这些作品产生超越时代的价值。这一点，从杜甫到鲁迅、从柳青到路遥，概莫能外。恩格斯曾指出，巴尔扎克作为政治上的保皇党却写出不朽作品，其根本原因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意思是，巴尔扎克忠实于现实，因此可以逾越其观念乃至时代局限，揭示出贵族阶级必然被打败的历史趋势。

柳青、路遥、贾大山忠于生活、忠于人民，扎根火热现实，所以才能在历史的风云变迁、现实的复杂纠结中体察到人民的悲欢与希冀，看到历史的暗流与激荡，找到时代精神与方向之所在。在这一基础上，他们从艺术规律出发，按照现实主义原则，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且赋予这些人以生动个性，由此超越时代、超越个人认知局限，创作出具有长久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的作品。重新认识他们的价值，对于我们重估当代文学史、省察当前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呼唤新时代的柳青、路遥、贾大山

张江：造就新时代的柳青、路遥、贾大山，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迫切愿望。将愿望化为现实，需要作家们克服若干现实困难。首先，市场经济于我们已经不是新生事物，但不少文艺创作者对待市场经济的态度还不够成熟理性。恐惧、回避、逢迎、追逐都不足取。其次，要敢为人先，开拓进取，把前无古人的伟大时代转换为前无古人的伟大作品。再次，重拾柳青、路遥、贾大山乃至一切文学先贤的品格和精神，扎根时代、研读生活，在生活的沃土中厚植作品。

赵慧平：尽管有无数关于文学的理论学说，文学终究离不开人的审美活动这一根本属性。人是文学活动主体，文学是人特殊的审美存在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在文学世界中呈现的是他自己——他的现实生活、他的情感世界、他的审美理想。一个作家拥有什么样的心灵、以什么样的观念与方法感受所处的时代、呈现时代中的人和人的精神，决定其是否能够创作出有艺术生命力的作品。

当今天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个时代不仅赋予作家参与推动民族复兴的幸运，也赋予作家创造历史的使命和责任。新时代召唤新创作，也为作家写出这个时代人的精神和审美理想提供良好契机。但是，必须看到今天仍然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原因是许多作家根本没有读懂新的时代，没有像柳青、路遥、贾大山那样站在人民大众立场感受新时代新生活，没有敏锐把握新的时代精神。

在当下文学语境中突破创作瓶颈，需要作家艺术家坚守文化立场、审美理想、价值观念，不为资本和利益所控，不为一时的流行思潮左右，深入生活，用心体会人民大众生存现实。柳青、路遥、贾大山就是这样的作家。他们真正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以人民角度感受新生活，这使他们有真知真识真情，在作品中灌注了自己全部生命和情感。新时代需要这样的作家。

在新时代学习柳青、路遥、贾大山和文学先贤，并不是要简单复制其文学表现形式，最根本的是要学习他们的立场和创造精神，像他们那样以理想观精神拥抱新时代，以文学的方式与人民大众一道参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展现新的时代气象。

张江：柳青、路遥、贾大山再次引发热议，是值得深思的现象。它折射了当下语境中我们对这三位作家品格和精神的留恋、渴望，更蕴含着大众对当下作家的期待和诉求。从数量到质量的跃进、从高原到高峰的攀登没有捷径可走，如果有捷径，那就是真正扑下身子，融入到人民大众生活中去，对文学和读者报以真诚。做到这一点，新时代的柳青、路遥、贾大山的出现就不再是梦想。

中国现代传记发展经历了曲折道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如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杨植林的《王若飞在狱中》、陶承的《我的一家》以及《高玉宝》《雷锋的故事》等，为激发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发挥重要作用，影响几代青少年。“文革”结束以后，传记蓬勃发展，目前长篇传记每年出版达到3000种以上，产生不少优秀作品，但良莠不齐、选题分散、重复等现象也比较常见，相关研究和评论也还不多。

传记以真实人物为基础，以文学或影视形式塑造人物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为此，我们当切实加强对传记写作和出版的组织规划，对选题科学论证，对作者精心选择，对质量严格把关。此外，有必要培养专门的传记写作、评论和研究人才，为振兴传记事业积蓄后备力量，不断推出传记精品。

我今年71岁，几乎是共和国同龄人。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了祖国的发展，对祖国的情感是融化在血液里的，我唱的、我写的很多歌曲都以家国情怀为主题。

《最美的歌唱给妈妈》是我一场音乐会的主题，也是我写的一首歌曲名。2011年建党90周年，我作为老党员想写一首歌唱给党。从新中国成立时艰苦的“一穷二白”走到现在，我和同龄人见证了祖国母亲迈出的每一步，也见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把这一心路历程写进歌词。歌的第一段唱到“妈妈哟妈妈，亲爱的妈妈，是你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是你领我走上光明的人生路”，做人要光明正大，我们从小爱的教育就是这样；第二段，“党啊党啊，伟大的党，我在你的旗帜下茁壮地长大，是你把我领上光辉的人生路”，是党培养了我，是党教育我爱人民爱国家；第三段，“祖国啊祖国，你是我温暖的家，我在你的怀抱里幸福地长大”，我感激祖国母亲，所以我要把最美的歌唱给妈妈。

《大爱永恒》这首歌也是这样。“太阳把爱给了大地，大地才有了光明；大地把爱给了万物，万物才有了生命；母亲把爱给了我们，我们才有了幸福的家园；祖国把爱给了我们，我们才有了美好的前程。”这是我理解的大爱。从当年利比亚撤侨到今年日本大地震中国公民，从2008年奥运会到2018年亚运会，以及今年汶川地震10周年我回想起当年随抗震回国的战士们……每次看到这些感人的事、看到中国国旗飘扬，我就想流泪。我一直想写首歌表达对祖国的情感，于是有了《祖国最亲》。“离开家乡的人，最觉得家乡亲；离开祖国的人，最觉得祖国亲。想起我的祖国，我是最幸福的人，看到五星红旗，热血胸中奔，听到国歌唱，热泪湿衣襟”。我写歌首先是写给自己、感动自己。

艺术创作要有真情，同时也离不开灵感，《骏马奔驰保边疆》来自我的生活体验。我20岁出头时在吉林做森林警察，是战士演出队成员，属于骑兵连。调到北京后，我很想念那段生活，有一次去部队慰问演出时突然有了灵感，20分钟就写好了这首献给骑兵的歌。我最早为人所知的歌是《采伐工人心向党》，那是我1973年写的，也是灵感触发。

写到这里，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你唱歌有味道？”我几次在“青歌赛”做评委，也好奇为什么很少有人选我的歌，回答是：“不敢唱，唱不出味儿来。”这都是因为积累的多寡。积累既来自艺术，也来自生活。《西游记》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本来是女声唱的，唱出来不是很打动人，剧组就请我试录。我从小看《西游记》长大，在我看来师徒四人就是人间各种人群的象征，取经路就是人生路。尤其当我看到这句“一番番春夏秋冬，一场场酸甜苦辣”很受触动，谱子上没有标注要唱滑音，但我想师徒历经八十一难，内心

一定也很苦涩，就自己加上两个滑音。录音当晚就送到导演杨洁那里，导演听了眼泪就掉下来，决定用这个版本。

为老百姓歌唱

蒋大为



为百姓歌唱

培养很多世界级器乐大师，但是声乐大师很少。为什么？器乐有国际统一技巧和标准，声乐不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种唱法。

中国声乐教育应该走什么路？我认为重点之一是建立中国自己的科学的民族声乐体系，解决唱好中国歌和唱好中国民族歌剧的问题。科学化不等于全盘西化。如果唱中国歌、唱中国歌剧，还要中国观众看字幕，悲哀不悲哀？每个人都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乐器，中国人唱出西方人的歌声，那是模仿秀。立足本土的同时积极借鉴他人经验，而不是扔掉自己特色全盘模仿他人，这是我理解的科学。

还是那句话，为人民服务、为百姓歌唱，就要写老百姓喜欢的歌，唱让老百姓听得清楚的歌，先入耳后入心。每种唱法都需要四个条件：语言、方法、情感、风格。语言是第一位的，不同语言旋律和节奏不同，要尊重语言本身。语言表达这能力越强，唱歌能力也就越强。此外，什么是唱歌？唱歌不是装腔作势，而是“字正腔圆，声情并茂”。现在批评书法界的“丑书”，声乐界也存在这个问题：人的声音就是一张名片，声音里有你的文化、修养和心态。

老百姓把你的名字记住了，你就是名人；名声是老百姓给的，不是自己封的，这一点不能忘。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支持我、关心我，让我有信心和力量继续为大家唱歌，为民族声乐努力。我也真的希望年轻人不要丢掉对音乐最初的爱，今后的高峰是靠年轻人攀登的，希望我们代代有高峰。

蒋大为，生于1947年，男高音歌唱家。曾任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现任中国音乐学院等高校客座教授。第一届“中国金唱片”奖获得者，曾获“五个工程”奖等奖项。代表歌曲有《牡丹之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敢问路在何方》《骏马奔驰保边疆》等。



一定也很苦涩，就自己加上两个滑音。录音当晚就送到导演杨洁那里，导演听了眼泪就掉下来，决定用这个版本。

为老百姓歌唱，在我看来还有一层重要含义，就是用“中国唱法”唱中国的歌。“中国唱法”经历了一定的时间的检验。我在70周岁时开了一场圆梦音乐会。为什么说是圆梦？国外歌唱家70岁还能开独唱音乐会，国内好像没有。我不是学院派出身，但一直在研究自己的艺术实践：唱中国歌应有自己的味道，现在“千人一声”缺乏辨识度，如果我在70岁还能唱出自己的味道、还能拿下一场独唱音乐会，说明我对中国民族声乐的理解有一定深度，说明我所探索的这条歌唱之路是科学的、可行的。

我把自己的唱法定义为“中国唱法”，即唱好中国歌的唱法。声乐艺术先关审美。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对声音的审美，中国老百姓就喜欢听你唱出中国人的声音、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味道。

我们的音乐教育培养出很多世界级器乐大师，但是声乐大师很少。为什么？器乐有国际统一技巧和标准，声乐不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种唱法。

中国声乐教育应该走什么路？我认为重点之一是建立中国自己的科学的民族声乐体系，解决唱好中国歌和唱好中国民族歌剧的问题。科学化不等于全盘西化。如果唱中国歌、唱中国歌剧，还要中国观众看字幕，悲哀不悲哀？每个人都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乐器，中国人唱出西方人的歌声，那是模仿秀。立足本土的同时积极借鉴他人经验，而不是扔掉自己特色全盘模仿他人，这是我理解的科学。

还是那句话，为人民服务、为百姓歌唱，就要写老百姓喜欢的歌，唱让老百姓听得清楚的歌，先入耳后入心。每种唱法都需要四个条件：语言、方法、情感、风格。语言是第一位的，不同语言旋律和节奏不同，要尊重语言本身。语言表达这能力越强，唱歌能力也就越强。此外，什么是唱歌？唱歌不是装腔作势，而是“字正腔圆，声情并茂”。现在批评书法界的“丑书”，声乐界也存在这个问题：人的声音就是一张名片，声音里有你的文化、修养和心态。

老百姓把你的名字记住了，你就是名人；名声是老百姓给的，不是自己封的，这一点不能忘。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支持我、关心我，让我有信心和力量继续为大家唱歌，为民族声乐努力。我也真的希望年轻人不要丢掉对音乐最初的爱，今后的高峰是靠年轻人攀登的，希望我们代代有高峰。

蒋大为，生于1947年，男高音歌唱家。曾任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现任中国音乐学院等高校客座教授。第一届“中国金唱片”奖获得者，曾获“五个工程”奖等奖项。代表歌曲有《牡丹之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敢问路在何方》《骏马奔驰保边疆》等。